**gift/礼物(Lǐ Wù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Michel Espagne | 15 Mar 2022 |

礼物（天赋）首先是一种全然天然的、积极的个性倾向。我们会说一个科学家有数学天赋，一个音乐家有音乐天赋。我们在此处的意思是，一种杰出的品质不被视作是天然的，而是一种天赋，最传统的表述方式是，努力将其所继承的品质定义为 "来自上天的礼物"。谁有天赋就意味着谁被上天选中，不需要对社会性的遗产有着任何亏欠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它打破了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考量，而这一词的大多数用法则恰恰相反——将其置于了社会交换之中。一些欧洲语言会根据各种礼物，使用不同的词（例如，德语更清晰地表达了“捐助（Spende）”、“礼物（Schenkung）”、"天赋（Begabung）”等之间的区别）。

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之上的。领主将一块封地让予他的附庸仆人。它确实是一种礼物，但接受它的人被置于对领主的依赖之中，而他更可以收回这一礼物。在任何情形下，封地的让予，都意味着附庸的仆人向宗主致以敬意。接受礼物，就意味着承认了一种依赖性。这种依赖性并非全然是封建社会所特有的，但它可以延伸成一种政治原则。对罗马帝国统治地位的承认，能够确保蛮族首领在大肆入侵时期，（实现）对类似于封地之实体的宗主权（suzerainty）。根据欧洲历史学家的常见观点，中华帝国广泛使用了以“礼物”换取政治统治地位承认的这一原则。毫无疑问，这份礼物甚至与建立直接的依附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可以为未来（成为）宗主国做好准备。故此在中亚地区利用丝绸，应是中国早期外交的一部分。甚至在成为商品之前，丝绸就是一种礼物。在新冠大流行期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受新冠影响的欧洲地区送口罩，这种捐赠就引起了“口罩政策”的怀疑，这种情况表明，捐赠让接受它的人非常担心。

多层面的恭顺和接受捐赠之间的系统性联系，往往使得捐赠看似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。我们知道《埃涅伊德》中拉奥孔的著名公式：“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”[我害怕达南人（Danaans），即使他们带着礼物拜访我们]。希腊人的礼物，给特洛伊人带来了毁灭。特洛伊的毁灭来自于接受了一份礼物，而拉奥孔已然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。被囊括进欧洲艺术史的一处插曲，便是植根于特洛伊木马这一礼物的故事。诚然，捐赠也可旨在于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长久和平关系，最好的例子是在婚姻中妇女的给予。在任何情况下，礼物都不一定是通过交换而获得可观利益的方式。恰恰相反，具有基督教神学渊源的自我牺牲的概念，意味着一种无互惠性的放弃，其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。礼物与牺牲的概念相联系，以此作为对基督牺牲的回答。牺牲（献祭）可以在许久之前被观察到，这与古希腊的一种经常性做法相符，其结果是感谢神灵，或通过向他们提供部分收获或部分畜群，以引来他们的仁慈。在一段时日的真正的牺牲过后，这个仪式变成了象征性的礼物，以撒的牺牲应是为了调和亚伯拉罕和他的神，但这并不导向杀死牺牲的人，（同时）这保留了基督教意义的牺牲。这种牺牲在整个艺术史中都在上演。在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中，在对耶稣受难的描绘中，舞台上经常出现一小的侧影为形式的，捐赠者的身影。基督牺牲的场景说明了自我的礼物，但这种礼物仅能通过画家从捐赠者那里获得的支持所展现。艺术收藏品构成中的捐赠制度，与艺术赞助一样，是对应于这些中世纪时期捐赠的一种延伸形式。艺术家去世后，继承人通过一种新的赠与方式，即付与（dation），将自己从继承权中解脱出来。

但在任何审美性的背景之外，作为礼物的自我牺牲可以是局部的，而且只能支配社会行为，就像献血或器官捐赠，或向科学捐赠身体一样去被编纂。在最简单的宗教生活层面上，救济属于宗教义务，穷人箱是每个教堂器具的一部分。自马塞尔·莫斯（Marcel Mauss）的名著《礼物》*《礼物：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及功能》*（1923-1924），以及克劳德·列维·斯特劳斯（Claude Lévi-Strauss）、莫里斯·戈德利埃（Maurice Godelier）和菲利普·笛卡尔（Philippe Descola）的补充和评论后，礼物已成为人类学思想的核心范畴。交换确然是社会关系的基础。而礼物则与交换相联系。只不过随着礼物的出现，出现了互惠的自动性（automaticity）问题。在《礼物》一文中所研究的波利尼西亚（Polynesian）社会中，如若可能，礼物需要一个具有更大象征意义的回赠礼。或者说，回赠礼不是强制性的，但回赠人的荣誉取决于回赠礼的价值，从而服从于一种精神力之压力，即“灵予”（hau）。在“波特拉奇“（potlatch）这一仪式中发生了螺旋式的互赠，这为赠送礼物的做法，提供了一种礼仪特征，以及近乎是宗教仪式的维度。这种成规的给予实践，造就了波利尼西亚部落和超越社会地位的结果。每件礼物和回赠礼的价值也具有主观性，我们也知道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社会关系的落成，是建立在高度不对称的礼物和回赠礼的实践之上的。礼物和回赠礼所隐含的团结，表达了社会的实质及其伴随时间的永久延续。

在殖民社会中引入货币，往往在极大而充分地通过礼物改变了制度化的互惠体系，从而不可挽回地摧毁殖民文化。在亚马逊或西伯利亚社会的表现中，自然界本身可以提供礼物，例如猎物或鱼，这在团结的伦理框架内，超越了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在内的限制。萨满教的做法，在人与自然之间组织了一个礼物与回赠礼的系统，其痕迹依旧可以从一年中某一天的表现中被察觉，这一天，人类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超过了地球一年的产量。在2021年，这是7月21日。对地球进行归偿的表现，指导着环境政策。

这种全球团结的表现，解释了没有回赠礼的捐赠实践，这是永恒主义和慈善形式的特点。永恒主义和慈善并非针对某人，而是涉及社会整体，如果没有某个人或某个社区提供的回赠礼，我们便可估计社会整全的凝聚取代了回赠礼。特别是当捐赠者或慈善家，从他们的捐赠中获得了强烈的象征性利益时，情形更是如此。捐赠也意味着对某人财富的炫耀，就像在重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时候，许多知名的商人展现了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支持。基金会于西方出现，在宽泛意义上是对积累的财富的象征性补偿，可以解释为对债务的支付，但基金会在大多数情况下。坚持除象征性的补偿外，别无反赠或互惠。

艺术史学家对捐赠者的考察，人类学家对“波特拉奇”的考察，古物史学家对“永动机”的考察，或现代主义史学家对慈善事业的考察，显然都是为了描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或遥远的民族群体，或是那些过去的时代。但在所有这些考察中，都有一浓厚的反思时刻，我们观察到的实质上是试图分析当代世界的运作规则，自莫斯以降对礼物进行的研究，努力描绘着这些规则。因此我们发现借助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，生活中的债务体系得以延续。货币不仅是商业交换中的一个中立中介，而且还代表一个特定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结果。金融就包括礼物和回赠礼的形式，在最先进的兼并和收购行动之中。我们不能从国家或私人公司的公共债务中排除任何捐赠的痕迹，因为重新谈判的那一刻，为整个基本社会关系的结构带来光亮。

从神学到经济学，再到人类学和科学生活的架构，礼物系统构建了西方社会。